

《善邻国宝记》

——一部最早的中日关系史

周 迅

中国和日本隔海相望，两国国家之间的交往，就现存文献而言，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世纪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“乐浪海中有倭人，分为百余国，以岁时来献见云”。自此以后，茫茫东海上信使往返，音问不绝。同时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，间或也曾怒目相向，甚至兵刃相见。两千年来丰富而生动的史实，早已引起无数中外史家的关注。第一个留心收集中日交往史料，辑成专书，传之后世的，是生活在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的日本禅宗僧人周凤。他编辑的《善邻国宝记》，约成书于公元1470年前后，是日本的第一部外交史。它虽然也涉及日本和朝鲜的关系，但主要着眼于“日本与震旦(中国)相通”之事，所以，它也是自有中日交往以来的第一部中日关系史。

《善邻国宝记》流传最广的版本，是日本京都书肆出云寺松柏堂刊本，跋记“丁酉之春”。据考证，此“丁酉”当是日本明历三年(1657)。此后有《续群書類从》本和《改定史籍集览》本，都是根据明历本排印的。这两个排印本较勘不精，衍文脱字，错简复出，一袭旧刊之谬。1932年东京文求堂书店出版的《新订善邻国宝记》(中岛竦校订)，对旧本下了一番校勘功夫，印刷也较精美，是明历本系统中比较好的一种。

明历本《善邻国宝记》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卷。上卷是从古代

到我国明朝洪武年间使者及著名僧侣往来的大事年表，大抵从当时所见中、日书籍中转录，尽管相当粗疏，尚可略窥千余年来中日关系的梗概。而且，“其所引古书，往往有今人所不逮见者，若《唐录》、《书籍后传记》、《海外国记》、元永元年诸家勘文及《日本古记》、《正续院佛牙舍利记》、《海印接待庵记》皆是，亦史家所不能舍而弗顾也。”（中岛竦：《新订善邻国宝记读者须知》）我国明代中叶出现的一些研究日本的著作如《筹海图编》等，虽然也附有《使倭事略》、《朝贡事略》之类大事年表，但多半只从正史中抄出，而且成书时间要晚于《善邻国宝记》几十年。

《善邻国宝记》最足珍贵的部分，是它的中、下卷。这两卷收录了日本足利幕府和中国、朝鲜之间的往来文书及其附件（即所谓“别幅”），计中国致日本者12件，日本致中国者11件，又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往来文书18件，起自我国明代建文三年（1401），止于成化十九年（1483），均为我国史书所不载。有明一代，中日关系上始终笼罩着倭寇的阴影，明政府苦于倭患，厉行海禁。永乐以后，更实行了“勘合”制度。所谓“勘合”，其实是明朝政府颁发的一种特许贸易证，除持有“勘合”的外国政府船只允许前来“朝贡”兼贸易外，其他海上往来一概禁绝。明政府又以允许“朝贡”为条件和日本当权者做交易，一方面摆起“大国”的架子，要求日本“敬天事大”，奉表称臣，另一方面指望通过日本幕府镇压倭寇。日本方面，当时处在连年战乱之后，幕府财源枯竭，由于“朝贡”贸易有惊人的巨利，所以千方百计要冲破明朝的限制，希望尽量扩大贸易规模。各藩侯寺社也纷纷伸手插足，甚至为了争夺“勘合”引起内争。同时，在日本内部，也有人反对向明朝称臣纳贡，认为这是“辱国外交”。双方的政策及个中曲折，在这批国书中都有着生动而具体的反映，与我国《明实录》、《明史》等史籍互相参照，不仅可以补我国史书之缺，某些方面还可以正我国史书之误。例如，永乐十五年（1417）明政府曾遣刑部员外郎吕渊等出使日本，责备日本

“朝贡不供，屡为边患”。《明实录》永乐十六年（1418）四月乙巳载：“行人吕渊自日本还，其国王源义持遣日、隅、萨三州刺史岛津滕存忠等奉表随来谢罪，……上以其词顺，特恕其罪。”但是从《善邻国宝记》看，足利义持继任幕府将军后，不满前任将军义满对中国的屈辱态度，曾一度决心和明朝断绝国交。永乐17年（1419）吕渊再次出使日本时，幕府在《谕大明使者》文中，明确宣布要“永绝外国之通问”，并责问吕渊：“去岁使船重来，亦使等持長老重传此趣，使臣归到本国，胡不以此意达尔主耶？”《善邻国宝记》还收了吕渊第二次到日本后给幕府的信，也说：“去岁……来日本国公干，令人通报，国王命古幢長老到海滨，未曾详审来意。長老旋车后，一向音讯不闻。”可见上年吕渊到日本确是碰了钉子回去的，义持决没有遣使“奉表随来谢罪”，明朝所接待的幕府使者无疑是冒充的（据日本史家研究，认为该使者是萨摩岛津氏所遣）。很可能吕渊等因为出使无功，惧怕朝廷问罪，也就通同作弊，未曾如实报告，造成了《明实录》这一笔误记。《明史·日本传》更直书为：“……明年四月，其王遣使随渊等来贡……愿贷罪，容其朝贡，……。”显然是跟着《明实录》弄错了。

国书的附件——“别幅”同正文分开，集中在下卷。“别幅”载有日本的“贡品”和明政府“给赐”物品的清单，品种、数量都一一详细开列，还载有缴、领“勘合”的情况，以及向对方索要物品的备忘录。这是研究当时中日经济关系的珍贵材料，从中可以看到两国输入、输出的主要物品以及相互之间的需求。例如，日本在十四、十五世纪，货币经济迅速发展，但日本本国从公元985年以后即不再铸钱，流通所需的铜钱全靠从中国进口。到足利幕府时代，甚至领主占有土地的多少，也以永乐钱为标准来计算，称为“永高”。《善邻国宝记》收有天顺八年（1464）八月十三日日本致中国书的别幅：“书籍铜钱，仰之上国，其来久矣。今求二物，伏希奏达，以满所欲。……永乐年间多给铜钱，近无此举，故公库索然，何以利民，钦待周急。”又有成化19年（1475）日本致中国书

别幅：“弊邑久承焚荡之余，铜钱扫地而尽，官库空虚，何以利民。今差使者入朝，所求在此耳。圣恩广大，愿得壹拾万贯，以满其所求，则赐莫大焉。”当时日本迫切需要铜钱的情况，以及对中国的铜钱的依赖，均跃然于纸上。

经过唐、宋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酝酿，从十三世纪末叶开始，在日本逐渐出现了一个汉文学的黄金时代，即所谓“五山文学”时期。这一文学时期。以京都和镰仓“五山”（最高等级的五大禅寺）的禅僧为代表。五山的许多僧徒都曾游学中国，擅长汉诗文，他们所写的汉文、汉诗，有些比起中国人来也毫不逊色，从中涌现出不少诗文名家和优秀学者，著名的如：雪村友梅，十八岁到中国，四十岁回国，曾奉诏主持长安的翠微寺；义堂周信，他的诗稿传到中国后，甚至被误认为中华人的作品；绝海中津，受到过明太祖接见，他在回答明太祖的询问时，当场赋了《日本熊野古祠诗》；汝霖良佐，曾在我国参加点校《大藏经》，明朝翰林学士宋景濂很赏识他的诗文，为他的作品写过跋。由于五山僧侣有熟悉中国情况和深通汉文的有利条件，加上足利幕府信奉禅宗，所以五山禅僧不但在文学上，而且在外交上也占有重要地位。设在相国寺鹿苑院的僧录司，本是统辖全国禅寺的僧职，实际上却经常参与国家的外交事务。鹿苑院南面的荫凉轩，是僧录司的辅佐机构，也称为副僧录。幕府将军足利义教“使荫凉轩主管秘书，一时荫凉有黑衣宰相之概，外交文牍悉藏于此。”（中岛竦：《善邻国宝记补遗》）当时的对外使节主要从五山僧侣中选拔，历届遣明正使几乎全是五山僧徒，国书也由僧人起草，正是：“使人僧也，撰书表者僧也，通好一切非僧不能办也，故国事多与僧事混。”（中岛竦：《新订善邻国宝记读者须知》）《善邻国宝记》的著者周凤，正是五山的著名禅僧之一。周凤生于1391年，卒于1473年。俗姓伴氏，号瑞溪，别号卧云山人，又号羸羊僧、竹乡子、刻楮子，日本和泉堺人。十四岁进入京都五山中位居第二的相国寺，曾先后主持景德寺、等持寺，1440年秋升任相国寺四十二

世。他曾经应幕府之请，三度入鹿苑院任僧录司之职。有《入东记》、《温泉行记》、《卧云日件录》、《卧云梦语集》等著作多种。周凤既曾三任僧录司，当然亲自参与了对明外交，并且有机会熟悉幕府的外交文牍。他和五山僧侣中的遣明使僧多有来往，而又非常注意了解中国。在他晚年的日记《卧云日件录》中，就多处记载了有关中国的事情，以及从明朝回来的僧友赠给他中国书籍的情况。他和1451年随遣明使到中国的一号船从僧笑云交谊密切，曾为笑云所著的《入唐记》作序，序中说，他和笑云时常见面，“予每会必问大明事，一一谕告，颇详悉矣”。因此，他的《善邻国宝记》绝非道听途说、辗转相抄之作可比，时至今日，仍不失为研究中日、中朝关系之必读书，经常被史家所征引。

除集录的史料之外，周凤为《善邻国宝记》所写的序、跋、按语，虽然文字不多，也同样值得注意。他在序言中感叹道：“此方学徒读震旦（中国）书者，知其国山川人物。读天竺书亦然。吾国虽有六国史等书，而读者鲜矣，故知本国事者几希矣。舍近取远，无乃左乎！今录两国相通之事，先当令人知我国之为神国之由。”所以开宗明义，先叙述了日本的开国神话，并把它放在上卷大事年表的前面，说明“大日本者神国也”。他批评足利义满在国书中用明朝年号和向明朝称“臣”，以为有“臣于外国之嫌”。在他所起草的日本宽正六年（1465年）遣大明书中，特别用了这样的句子：“黄河北流，一清以生上圣；白日西照，再中以发皇明。”他在按语中解释说，“黄河”代表中国，它流向日本所在的东海；“白日”则指日本，暗含着“日出于东而临于彼”的意思，说明中、日两国不分上下。看来当时的明朝政府完全没有领会他的这番深意，但周凤在这里确实表现出一个日本知识分子的爱国心，对于明朝封建政府妄自尊大的外交政策，多少是一种批判。为此，周凤一直受到后世日本人的称赞，认为“其识见高迈卓绝，当时之缙绅乃至缙流中无出其右者。”（《五山诗僧传》）尽管如此，周凤对中国是怀着友好感情的，作为一个佛教徒，一个汉文学家，他向往着两国之间

的自由往来，向往着扩大文化交流。他强调“善邻为宝”。《左传》有曰：“亲仁善邻，国之宝也。”周凤熟悉汉籍，所取的书名或者就是根据于此。他在序中特别说明，所谓“宝”，是指“三宝”，即“佛、法、僧”。“凡商舶往来，得货财以富吾国，亦善邻为宝之一端乎？然此皆入海求七宝之类，专为利尔。”“专为利”是周凤所不取的。他又在跋中说：“自古两国商舶来者往者相望于海上，故为佛氏者，大则行化喝道之师，小则游方求法之士，各遂其志。元朝绝信之际尚尔，况其余乎？有勘合以来，使船之外，决无往来，可恨哉！”对由于倭寇和明朝的海禁所造成的隔绝状态，抱憾之情，溢于辞表。这显然不是周凤独有的思想，而是代表着在日本外交上颇有影响的一批五山僧侣。例如，稍晚于周凤的景徐周麟也说过几乎同样的话：“中华初无勘合之信，往来者各从其志。永乐之后，以勘合为符信，不捧表文，不持勘合者，禁而不入。得一入者，其留仅历一年。但货财交易，作贾胡留耳！何因得仿佛先辈之万一耶。”（《翰林葫芦集·送贞友竹游大明国序》）这也不仅仅是五山僧侣的思想，毋宁说，它是当时日本经济需要的反映。周凤等人的主观愿望可能是真诚地为着“善邻”和文化交流，但是他们的主张，实际上和幕府以至各藩侯寺社的利益完全一致，可以说是幕府对明朝态度的一种折射吧。

现在通行的《善邻国宝记》中，所收的日本文明七年（1475）和文明十五年（1483）的《遣大明表》，时间都在周凤去世以后，体例也和其他不合。说明此书已经经过后人加工。原貌究竟如何，可惜不得一见。另外，据说日本大仓山文化科学图书馆和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还藏有《善邻国宝记》的手抄本，抄写年代不明。两本对校，字句有相当差异，但都只有一册，包含明历本上的上、中卷、却无下卷；并且都有“私云右书旧本并记之”、“私云旧本此处多白纸”之类记载，为明历本所无，可能是明历本以外的别一系统的本子。（参看中岛健夫：《中世海外交涉史之研究》第六章）

《善邻国宝记》囿于著者的个人见闻，仍不免有所缺漏，同时连后人窜入的在内，也只截至1483年为止，因此，问世之后，不断有人仿具体例续作。现在见到的有：《续善邻国宝记》、《续善邻国宝外记》，都收在《续群书类从·杂部》和《改定史籍集览》第21册，编者及编辑年代不明。前者收1473年至1660年日本和中、朝来往文书，后者收1525年至1675年日本与中、朝来往文书及一些个人的赠答诗文。《善邻国宝别记》1卷，收在《续群书类从·杂部》，收1506年至1673年日、朝往来文书。以上三种书篇幅都不大，内容较芜杂，和中国有关的篇章不多。日本宝永八年(1711)松隐玄栋也编有《续善邻国宝记》，收日本天正至天和年间(1573—1683)中、朝往来文书。此书只有抄本，但未见。续书中比较好的，是中岛竦所辑《善邻国宝记补遗》，从《筹海图编》、《明实录》、《邻交徵书》、《戊子入明记》、《翰林葫芦集》、《续善邻国宝记》等中、日史籍中，辑出1369年至1556年间有关中、日国交的外交文书16件，附于《新订善邻国宝记》之后。

这里还应该提及的一点是，《善邻国宝记》全书都用汉文，可以免我国学者翻译之劳。可惜这部和中国关系如此密切的著作，至今未见有中国版本问世，欣闻中华书局将出版《中外关系史译丛》专收古代外国涉及中外关系史的名著，或许这部书已经引起了编者的注意吧。

